

# 户农地所有权认知及其对农地流转意愿的影响

## ——基于湖北两县 483 个样本农户的实证研究

钟涨宝<sup>1, 2</sup> 胡梦琪<sup>21</sup>

(1. 华中科技大学 社会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4;

2. 华中农业大学 农村社会建设与管理研究中心, 湖北 武汉 430070)

**【摘要】:** 农户农地流转意愿是农地流转市场潜在需求与供给的重要体现。通过对湖北两县 483 个样本农户的实证数据分析, 并建立 Logistic 回归模型, 发现: (1) 整体上农户的转入意愿较低, 转出意愿较高, 且因地区不同而呈现明显差异; (2) 农户农地所有权认知仍倾向于“国家化”, 只有 12.4% 的农户能正确认识到“农地归农民集体所有”; (3) 认为农地所有权归集体所有的农户更愿意转入农地且更不愿意转出农地, 我们应对这部分愿意种地、作为内生型农业经营大户的潜在培养对象的农户予以重视。基于以上分析, 提出因地制宜地优化农地资源配置、创新农地产权相关制度宣传方式、完善农地集体产权制度, 并鼓励各地区根据实际情况借鉴已有成功案例发展集体经济, 以发挥产权清晰的最大效用。

**【关键词】:** 农地 所有权认知 流转意愿 Logistic 回归 模型

**【中图分类号】:** C912. 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33X(2018)04-0100-06

### 一、问题的提出

合理的农地流转能有效解决家庭承包责任制下分散经营所引发的农业生产低效率问题, 是实现农业现代化规模经营的重要途径<sup>[1]</sup>。实现农地市场流转最终取决于农地的市场需求和供给<sup>[2]</sup>, 农户作为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主体, 其流转意愿是决定其流转行为是否发生的最直接因素<sup>[3]</sup>, 也是农地流转市场潜在需求与供给的重要体现。

现有研究<sup>[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sup>在不同角度上论证了产权认知对农地流转的影响作用, 但在对解释变量的处理上忽略了各部分权利认知对意愿的单独作用, 考虑到各部分权利认知间可能有相互影响, 甚至抵消作用, 不利于明确各部分权利认知的单独作用方向, 得出的结论也较笼统。另外, 自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通过对农户的农地承包经营权不断细化、明晰化, 维护农户对农地的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等, 却对农地的集体所有制“置之不理”, 弱化了集体产权的实践, 双层经营有名无实, 使得农地得到充分利用的可能性降低<sup>[21]</sup>, “农地确权颁证工作”的大力推进, 也仅仅是基于对农地承包经营权的确权。产权的实践不仅受法律规定的影响, 还受人们的认知的影响, 人们会依据经由自身理解后形成的产权认知边界行事和处理问题。结合理论与实际, 笔者认为为了更全面地了解影响农户农地处置行为和农地流转市场的因素, 关注农户对农地所有权的认知是很有必要的。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农地确权、流转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16ASH007)。

**作者简介:** 钟涨宝, 男, 华中科技大学/华中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农村社会学。E-mail: 275220522@qq.com。

在农业正面临现代化转型和农地确权背景下,了解当下农户对农地“集体所有”是否有清晰的认知,以及农户对农地所有权认知的实际情况、不同的认知会产生怎样的后果,有利于提高农村集体经济意识,拓宽农业功能和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使用方式,对推动正处于瓶颈期的农地流转市场发展有着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因此,本文试图基于湖北省两县样本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运用 Logistic 回归模型,探讨农户农地所有权认知及其对农户农地转入意愿和转出意愿的影响。

##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描述

### 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用的数据来源于农地确权、流转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研究调查课题组 2016 年 9 月至 11 月间对湖北省黄冈市红安县和洪湖市监利县农户所开展的问卷调查。需要提及的是,鉴于问卷内容需要,本调查需访问被访农户家庭中对家庭农地耕种和管理较为清楚的成员,因此在每个样本农户中尽量选择户主作答,以较好地保证所收集信息的真实性和有效性。最终获得 9 个镇(街道)的 24 个村(社区)的 505 个有效农户样本。结合本研究主题,剔除缺失个案和相关类别数量过少(1-3 个)的个案,得到最终纳入模型进行分析的 483 个农户样本。在所选样本中,湖北省红安县共 276 户,湖北省监利县共 207 户。

样本基本特征主要反映在四个方面。(1)性别。男性 380 人,占 78.7%;女性 103 人,占 21.3%。(2)年龄。44 岁及以下 56 人,占 11.6%;45-49 岁 252 人,占 52.2%;60 岁及以上 175 人,占 36.2%。(3)文化程度。未上过学的 91 人,占 18.8%;小学 167 人,占 34.6%;初中 183 人,占 37.9%;高中/中专/技校 39 人,占 8.1%;大专及以上 3 人,占 0.6%。(4)职业类型。全职务农 271 人,占 56.1%;兼业务农 155 人,占 32.1%;全职非农 38 人,占 7.9%;退出劳动 19 人,占 3.9%。总的来说,样本结构基本符合该地区人口社会特征,样本代表性较好。

### 2. 理论模型。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农户的农地流转意愿,包括转入意愿和转出意愿,分别有“愿意”和“不愿意”两个选项,为二分类选择变量,两者概率之和为 1,基于此拟建立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模型具体形式为:

$$P(Y = 1/x_1, x_2, \dots, x_m) = \frac{1}{1 + e^{-(\beta_0 + \beta_1 x_1 + \dots + \beta_m x_m)}} \quad (1)$$

其中,  $P$  为农户愿意转入/转出的事件发生概率,  $x_m$  为第  $m$  个影响农户农地流转意愿的自变量,包括主要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  $\beta_0$  为常数项,  $\beta_m$  为自变量回归系数。  $e$  为事件发生概率与未发生概率的比,对其进行  $P$  的 logit 变换:

$$\text{logit}P = \ln\left(\frac{P}{1-P}\right) = \beta_0 + \sum_{i=1}^m \beta_i x_i \quad (2)$$

### 3. 变量测量与描述。

(1)因变量。农户农地流转的意愿,包括转入意愿和转出意愿,为二分类变量,将愿意转入/转出农地赋值为“1”,不愿意转入/转出农地赋值为“0”。需要说明的是,本调查所设计的问卷中关于农户农地流转方面的题项是包含筛选过程的,先调查该农户有无转入/转出行为,若没有,再进一步询问其转入/转出意愿。笔者认为,有转入/转出行为的农户,不论是本身就愿意转入/转出,还是因各种外部原因而转入/转出,均可视为最终有转入/转出意愿,遂将这部分农户与通过问题的回答而表示愿意转入/转出的

农户一同作为“愿意”组进行分析。

(2)自变量。农户对农地所有权的认知,即农户对农地所有权权属对象的认知,为多分类变量,包括“国家所有”、“集体所有”、“国家集体共有”和“农户所有”四类。因农户农地转入和转出意愿受其农地所有权认知的影响机制不同,为了更好地说明后者对前者的影响,本文将农户农地所有权认知变量进行了哑变量处理。农地承包经营权产权残缺,主要表现为农地所有权权属混乱和多重所有,不利于激励农户对农地的生产投入,并且会提高农地交易成本,最终减弱农户对农地的供给和需求<sup>[9]</sup>,而安全的产权认知能有效激励农户的农地转入意愿。因此,本文在农户流转意愿模型建立中以“农户所有”为对比参照组。

(3)控制变量。已有研究成果表明,农户非农化程度通过保障功能替代的作用机制对其农地流转意愿有较为显著的影响,本文分别从个人层面的非农化和家庭层面的非农化选取这部分的控制变量,前者用被访者职业类型表征,后者用家庭劳动力非农人数占比和家庭总收入非农占比表征。另外,考虑到农地转入和转出涉及到面积的变化,当农地面积达到一定的大小时,使用农业机械能有效提高生产效率,遂将家中是否有农业机械也作为控制变量。最后,各地区地理状况和经济水平不同,必然会影响到农户农地流转的意愿,因此需要控制地区差异的影响。需要说明的是,一般情况下农地流转行为是通过家庭中主要成员共同协商决策后的结果,非单个成员的决定,所以,被访者个体的性别、年龄和文化程度等差异并不能对农地流转产生直接影响。

综上所述,本文将被访者职业类型、家庭劳动力非农人数占比、家庭总收入非农占比、家中是否有农业机械和地区设置为控制变量。

各自变量和控制变量的赋值情况:(1)因变量。农地转入意愿,均值 0.46,标准差 0.50;农地转出意愿,均值 0.55,标准差 0.50。(2)自变量。农地所有权认知,均值 1.65,标准差 1.07。(3)控制变量。职业类型,均值 1.06,标准差 0.80;家庭劳动力非农人数占比,均值 0.48,标准差 0.27;家庭总收入非农占比,均值 80.10,标准差 25.13;是否有农业机械,均值 0.37,标准差 0.48;地区,均值 0.43,标准差 0.50。

### 三、结果分析

#### 1. 农户农地流转意愿情况及其地区差异。

如表 1 所示,总体来看,农户转入意愿较低,转出意愿较高。农业的高成本、高风险和低收益极大地增加了农户的农业负担,使得农户对非农收入的期望较大<sup>[22]</sup>,希望在自身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地从农地中解放出来,以增加非农收入,扩大收入来源。

就地区差异来看,在红安县,大部分农户愿意转出农地而不愿意转入农地,监利县的情况与之相反。

表 1 不同地区农户农地流转意愿差异状况 (%)

| 地区   | 转 入                       |      | 转 出                        |      |
|------|---------------------------|------|----------------------------|------|
|      | 愿意                        | 不愿意  | 愿意                         | 不愿意  |
| 红安县  | 30.4                      | 69.6 | 75.0                       | 25.0 |
| 监利县  | 67.6                      | 32.4 | 29.0                       | 71.0 |
| 总体   | 46.4                      | 53.6 | 55.3                       | 44.7 |
| 卡方检验 | $\chi^2=65.814$ (P=0.000) |      | $\chi^2=101.310$ (P=0.000) |      |

#### 2. 农户农地所有权认知现状。

如表 2 所示, 农户农地所有权权属认知呈现出高度“国家化”趋势, 这与已有研究所得结论相符。

表 2 农户农地所有权权属认知现状

|         | 农户所有 | 集体所有 | 国家所有 | 国家集体共有 | 合计  |
|---------|------|------|------|--------|-----|
| 频数 (人)  | 64   | 60   | 329  | 30     | 483 |
| 百分比 (%) | 13.3 | 12.4 | 68.1 | 6.2    | 100 |

3. 农户农地流转意愿影响因素的 Logistic 回归结果分析。

农户转入意愿和转出意愿的 Logistic 回归模型估计结果, 其中, 模型 I 和模型 III 是只放入控制变量的基础模型, 模型 II 和模型 IV 是在控制变量基础上添加了农地所有权认知变量的最终模型。所有模型均在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且通过了 Hosmer 和 Lemeshow 检验 ( $p>0.05$ ), 说明模型适配性较好。通过整体对比发现, 模型 II 相比于模型 I 来说, -2 倍对数似然值减小, NagelkerkeR<sup>2</sup> 增大, 说明加入的自变量对模型具备一定的解释力; 最终模型的 NagelkerkeR<sup>2</sup> 为 0.348, 相比于模型 I (R<sup>2</sup>=0.325) 有显著提高, 说明最终模型拟合度和解释力较好。模型 III 和模型 IV 之间也是如此。

(1) 控制变量对农户农地转入意愿的影响。模型 I 的回归结果显示, 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

就职业类型来说, 相比于退出劳动的农户, 其他类型农户转入农地的意愿更高。兼业务农的农户最有意愿转入农地, 其次是全职务农, 最后是全职非农。

家庭劳动力非农人数占比在 5%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影响农户的农地转入意愿, 农户家庭劳动力非农人数占比越大, 越不愿意转入农地。

家庭总收入非农收入占比在 10%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影响农户的农地转入意愿, 非农收入占比在 90% 以上的农户相比于非农收入占比 90% 及以下的农户更不愿意转入农地。

家中是否有农业机械在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影响农户的农地转入意愿, 有农业机械的农户比没有农业机械的农户更愿意转入农地。农业机械能有效缩短单位面积内农业工作时间, 节约劳力, 适合较大面积的种植。

地区变量在 1% 的统计水平上对农户农地转入意愿有显著影响, 监利县农户比红安县农户更愿意转入农地, 这与描述统计分析部分的结论一致。

(2) 农地所有权认知对农户农地转入意愿的影响。模型 II 与模型 I 的对比结果显示, 农地所有权认知对农户农地转入意愿有显著影响。认为农地所有权归国家所有和归国家集体共有的农户与认为农地所有权归农户所有的农户的农地转入意愿有显著差异, 后者更愿意转入农地; 认为农地所有权归集体所有的农户与认为农地所有权归农户所有的农户的农地转入意愿无显著差异。

究其原因, 一方面, 认为农地所有权归自己所有的农户主观上对农地有更多的自主处置权, 能更自由地以自我收益最大化为原则进行农业经营决策; 另一方面, 农户对农地所有权的认知是经由个体经验感知建构起来的, 外界的干预是造成农户认知形成的重要原因<sup>[23]</sup>, 逆向推导可知, 认为农地所有权属于自己的农户在以往的实际农地生产经营中受到的外界干预更少, 对农地的持有更具安全感, 因而更愿意转入农地。另外, 在外界的干预力量中, 集体与农户间的对抗力应属最弱, 一是集体与农户间的博弈非零和博弈, 两者有共同利益关系; 二是基层民主决议制给了农户在村庄事务决策上一定的交涉协商空间和反抗空间, 因而相比于

国家强有力的、几乎不可抗的干预力量,集体更显亲和;三是集体本身就存在产权模糊,权利主体不够明晰,在实践中的权威性有所弱化。因此,认为农地所有权归集体所有与认为农地所有权归农户所有的农户在农地转入意愿上无显著差异。

(3)控制变量对农户农地转出意愿的影响。模型III的回归结果显示,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

就职业类型来说,相比于全职务农的农户,其他类型农户农地转出的意愿更高,退出劳动的农户转出农地的意愿最高,其次是全职非农的农户,最后是兼业务农的农户。

家庭劳动力非农人数占比在 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影响农户的农地转出意愿,农户家庭劳动力非农人数占比越大,越愿意转出农地。

地区变量在 1%的统计水平上对农户农地转出意愿有显著影响,监利县农户比红安县农户更不愿意转出农地。

关于家庭总收入非农占比、是否有农业机械对农户的转出意愿影响不显著,说明影响农户转出农地意愿的因素主要是家庭成员的就业情况。

(4)农地所有权认知对农户农地转出意愿的影响。模型IV与模型III的对比结果显示,农地所有权对农户农地转出意愿有显著影响。认为农地所有权归国家集体共有的农户与认为农地所有权归农户所有的农户的农地转出意愿有显著差异,前者更愿意转出农地;认为农地所有权归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的农户与认为农地所有权归农户所有的农户的农地转出意愿无显著差异。

结合上述分析可知,农户对农地所有权的拥有幻觉能给予其一定的农地使用安全感以及利益最大化导向的自由处置权利,而当农地所有权权属对象为双重他人所有时,农户自然更愿意转出农地而不是持有农地;此外,认为农地产权归集体所有的农户成员身份认同感更强,对农地的禀赋性依赖更重,可能会因为自我赋予的对农地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而更不愿意转出农地。

## 四、结论与讨论

基于湖北省两县 483 个农户样本的实证数据,通过建立 Logistic 回归模型,探讨农地所有权认知对农户农地流转意愿的影响作用,研究结论如下。

首先,整体来看,农户的转入意愿较低,转出意愿较高,供大于需。地处平原的监利县农户大多愿意转入农地(67.6%),而处于丘陵地带的红安县农户大多愿意转出农地(75%),农地流转市场的潜在需求与供给状况因地区不同而呈现明显差异。

其次,就农户农地所有权认知现状来看,农户农地所有权认知仍倾向于“国家化”。在 483 户样本农户中,只有 12.4%的农户能正确认识到“农地归农民集体所有”。大部分农户对农地所有权仍存在严重的认知不清晰问题,使得农地集体产权形同虚设,既不利于农村集体观念的形成和发展集体经济,也不利于产权清晰基础上各生产资料的自主结合,阻碍了承包经营权流转范围和方式的多元化发展,制约了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方向选择。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为什么还会出现农户对农地所有权权属认知还存在如此大的偏差呢?一方面,由于国家在法制完善上对集体产权的忽视,集体土地统一经营仍存在着一定的适法困境<sup>[24]</sup>,使得大部分村庄中农地集体产权有名无实,弱集体化的产权实践下农户难以建构“农地集体所有”认知;另一方面,国家法律法规在农民群体中的宣传还不够完善和充分,基层工作人员对于向农民群众传达国家政策仍持较消极的态度,该环境下农户只关心与自己现行利益直接相关的农地使用权。

最后,就农地所有权认知对农户农地流转意愿的影响来看,转入意愿方面,认为农地所有权归“农户所有”的农户比认为农地所有权归“国家所有”和归“国家集体共有”的农户更愿意转入农地,与认为农地所有权归“集体所有”的农户无显著差异。

转出意愿方面,认为农地所有权归“农户所有”的农户比认为农地所有权归“国家集体共有”的农户更不愿意转出农地,与认为农地所有权归“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的农户无显著差异。上述研究结果表明,认为农地所有权归集体所有的农户更愿意转入农地且更不愿意转出农地,我们应对这部分愿意种地、作为内生型农业经营大户的潜在培养对象的农户予以重视。外来资本农场在农业经营过程中存在对村庄侵略性强、管理成本高、监管风险大等问题,且在农场劳动组织和管理过程中造成了对农业雇工的劳动和社会再生产的控制与剥夺<sup>[25]</sup>。在过密型农业仍将长期持续的前提下,完全出于自愿、更为灵活稳健、使流转双方真正达至互利共赢的农户自发流转与大部分农户家计更为适应,对于这种农户智慧创造的制度创新应该给予足够的尊重<sup>[26]</sup>。因此,具经济、社会、生态等多重价值的小农式精耕细作仍是推进村庄农地流转市场多元化稳健长效发展的主体,留住这部分愿意种地、集体成员身份认同感较强的农户显得尤为重要。

结合上述分析,为了更完整地发挥农地产权清晰的最大效用,拓宽承包经营权流转范围和方式,为促进我国农地流转市场的完善和发展注入新推力,实现农业现代化经营,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因地制宜地优化农地资源配置,对于农地潜在需求大于供给的地区,着重培养该地经营大户,并促进其他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流动;对于供大于需的地区则做好荒地的开发利用、招商引资。

第二,创新农地产权相关制度的宣传方式,针对不同群体采用不同的宣传手段,以有效引导农户对“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的正确认知的形成。

第三,完善农地集体产权制度,避免因产权不清晰而阻碍农地集体产权正常实践,并对适合通过集体经营来促进农业规模现代化发展的地区加大鼓励和扶持力度,在发展模式选择上可结合自身实际借鉴已有成功案例,如苏南地区的“新集体经济模式”<sup>[27]</sup>。

随着党的十九大召开,确立了新时代下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三农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解决好“三农”问题始终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应认识到三权缺一不可,在对承包经营权进行确权颁证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推进农地集体产权的清晰,提升农户对农地集体所有的认知度,以发挥产权清晰的最大效用。

#### 参考文献:

- [1]洪名勇,关海霞.农户土地流转行为及影响因素分析[J].经济问题,2012(8):72-77.
- [2]钱忠好.农地承包经营权市场流转:理论与实证分析——基于农户层面的经济分析[J].经济研究,2003(2):83-94.
- [3]李启宇,张文秀.城乡统筹背景下农户农地经营权流转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成渝地区428户农户的调查数据[J].农业技术经济,2010(5):47-54.
- [4]杜文星,黄贤金.区域农户农地流转意愿差异及其驱动力研究——以上海市、南京市、泰州市、扬州市农户调查为例[J].资源科学,2005(6):90-94.
- [5]钟涨宝,寇永丽,韦宏耀.劳动力配置与保障替代:兼业农户的农地转出意愿研究——基于五省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2):84-92,154-155.
- [6]聂建亮,钟涨宝.保障功能替代与农民对农地转出的响应[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5(1):103-111.

- 
- [7] 吕军书, 李茂. 农业比较利润视角下我国农地规模化经营的实现路径[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4): 78-82.
- [8] 仇童伟, 石晓平, 马贤磊. 农地流转经历、产权安全认知对农地流转市场潜在需求的影响研究——以江西省丘陵地区为例[J]. 资源科学, 2015(4): 645-653.
- [9] 钱忠好.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产权残缺与市场流转困境: 理论与政策分析[J]. 管理世界, 2002(6): 35-45, 154-155.
- [10] 姚洋. 中国农地制度: 一个分析框架[J]. 中国社会科学, 2000(2): 54-65.
- [11] 许恒周, 郭忠兴. 农村土地流转影响因素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基于农民阶层分化与产权偏好的视角[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1(3): 94-98.
- [12] 刘长全, 杜旻.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创新与改进方向——基于温州农村改革试验区的考察[J].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1): 72-78.
- [13] 罗必良. 农地流转的市场逻辑——“产权强度-禀赋效应-交易装置”的分析线索及案例研究[J]. 南方经济, 2014(5): 1
- [14] 阙祥才, 种道平. 农村土地流转中的农民权利意识研究[J]. 湖北社会科学, 2005(6): 72-74.
- [15] 洪名勇, 施国庆. 欠发达地区农地重要性与农地产权: 农民的认知——基于贵州省的调查分析[J]. 农业经济问题, 2007(5): 35-43, 111.
- [16] 晋洪涛, 史清华. 农村土地权属: 农民的“非集体化”认知与根源——基于河南的调查[J]. 农业经济问题, 2011(1): 7-12, 110.
- [17] 钱忠好. 农村土地制度变革农户心态的实证分析及其政策启示——对江苏无锡、泰兴、连云港三市(县)部分农户有关土地制度问题的问卷调查[J]. 中国农村经济, 1997(4): 66-70.
- [18] 梅东海. 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农民土地意识——浙、鄂、渝三地调查报告[J]. 中国农村观察, 2007(1): 36-46, 81.
- [19] 徐美银, 钱忠好. 农民认知视角下的中国农地制度变迁——基于拓扑模型的分析[J]. 农业经济问题, 2008(5): 61-67.
- [20] 曾福生. 农地产权认知状况与流转行为牵扯: 湘省 398 户农户样本[J]. 改革, 2012(4): 69-73.
- [21] 高飞. 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的法理阐释与制度意蕴[J]. 法学研究, 2016(3): 3-19.
- [22] 陆益龙. 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民需求及影响因素——基于 2006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分析[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8(3): 89-96.
- [23] 陈胜祥. 农民土地所有权认知与农地制度创新——基于 1995—2008 年实证研究文献的统计分析[J]. 中国土地科学, 2009(11): 21-26.

---

[24] 祝之舟. 论实现农村集体土地统一经营的法律路径——基于对全国 12 省 36 县的调研[J]. 现代经济探讨, 2012(10):75-79.

[25] 潘璐, 周雪. 资本农场中的农业雇工:剥夺与异化——对四川葛村资本农场的实地研究[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2):15-24.

[26] 孙新华. 土地流转与农户家计:两种流转模式的比较——基于江西省 T 村的实证调查[J]. 贵州社会科学, 2012(4):77-83.)

[27] 倪羌莉. 苏南新集体经济崛起的启示[J]. 产业与科技论坛, 2017(23):26-27.